

评西方翻译理论中的读者因素

朱 英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以西方翻译理论为背景,结合接受美学中的阅读理论,借鉴传播学和解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应辩证地看待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既不能忽视译文读者对译本理解的差异,也不能低估译文读者的创新期待。同时,对读者因素的强调不能成为译文脱离原文的借口,满足读者的要求必须建立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读者 辩证 忠实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6)04-0075-03

一、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读者因素

在两千余年的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很早就有人注意到读者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提出的翻译风格论,便是读者分析的最早雏形。他指出,翻译必须注意的3种风格(朴素风格、典雅风格、庄严风格)取决于不同的读者对象,并且根据读者的需要,这3种风格可融为一体。奥古斯丁第一个明确提出根据不同读者的要求进行翻译,虽然主要针对基督教的翻译而言,但其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他的读者分类法对以后的翻译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语言学家西奥多·萨瓦里的读者分析理论就深受奥古斯丁的启发。他在《翻译的艺术》中指出译文读者应分为4类:①对源语一窍不通的读者;②学习源语语言的学生;③过去对源语有所了解的读者,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几乎全部遗忘了;④精通源语的学者^[1]。

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读者是译文服务的最主要对象,这个观点从中世纪开始,逐步为翻译家们所接受。

中世纪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虽然仍旧缺乏系统性,但翻译过程中的归化和移植之争仍十分激烈,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观点:①翻译必须严格模仿原文(拉丁文)的语言风格和方法;②翻译必须严格遵守译文语言的规则,从而为大众所接受。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西方各民族的自我意识逐步增强,翻译者不再机械地模仿拉丁语,他们把翻译重点从偏重源语语言转移到重视译入语言,译文

读者受到空前重视。这个时期的《圣经》翻译便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马丁·路德在将《圣经》译成德文的过程中,便遵循了能为大众所接受的通俗明了原则,在理论上,他提出“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2]”。他尽量将原文中拉丁语的形式和内容译成地道的德语,为德语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此以后“译文必须为读者服务”逐步成为一条最基本的翻译原则。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为读者服务?是顺应读者已有的审美能力,还是希望通过译文提高译入语读者的文学鉴赏水平,从而尽量保留原文的异域特色,这些都成为翻译界争论的焦点。典型例子就是19世纪纽曼与马休·阿诺德之争。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他们都将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提高到作为评判译文质量标准的高度。现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读者反应等效论”与阿诺德、纽曼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认为“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和原文读者对于原文的反应要最可能地保持一致。因为两种语言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尽相同,我们无法要求这两种反应绝对一致,但这两种反应必须高度对等,否则翻译的目的便无法达到。^[3]”

从古到今,西方翻译界的学者们提出了大量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和原则。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都对译文读者给予了高度重视,使译者能根据心目中不同的读者群有的放矢,从而产生了大量适合于不同层次读者阅读的优秀译作。读者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但是,这些翻译理论或原则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译本,但就同一种译入语而言,一部作品在一个时期很少有超过两种以上的优秀译本,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看到适合自己的译本,因此按读者分类法去创造不同译本的想法在现实中显得过于理想化。

2)对于阿诺德与纽曼的争论焦点,即“译本的好坏究竟由学者说了算还是普通读者说了算”,在今天看来显得幼稚可笑。吕俊教授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翻译研究,认为传播过程中的七大要素,也适用于翻译研究。即①谁传播②传播什么③通过什么传播④向谁传播⑤传播的目的⑥传播的场合⑦传播的效果^[4]。这七大要素也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整体。各要素之间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在传播过程中,尤其是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时代的翻译,各要素之间有很多变量,因此对这些变量的分析必须建立在整体性原则基础之上。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将古希腊文化视为法国文化的宝库。那时《伊利亚特》的译者恨不得将原文一字不差地翻译成法语,给法国读者以教化。但到了18世纪,荷马在法国人心目中不再那么神圣了,有学者声称要用“现代”的标准重新审视《伊利亚特》的艺术性。此时该书的法译本便不那么忠实于原著了,经常针对法国读者的口味对原文内容进行修改^[5]。由此可见,翻译过程中某一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要素发生改变。想以一条或几条原则来厘定翻译标准,或简单从译文本身判断能不能为广大读者接受都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这都是对翻译的整体性缺乏认识。

3)读者反应作为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在理论上缺乏依据。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化氛围、不同受教育程度以及性格、好恶、心情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千差万别导致了不同读者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或理解。“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文本身就是译者对原文理解的产物,译者本身就是读者,因此,要最终达到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理解的高度一致,在理论上显然有失偏颇。

4)片面追求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反应的一致容易造成译者对原文内容进行任意删改和变动。奈达为了能让现代读者理解,将古人见面打招呼时习惯彼此“神圣地亲吻(greet on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改译为“非常热情地握手(a hearty handshake)”。笔者曾就此问题当面请教于奈达先生。他认为这种译法体现了功能对等原则,因为今天我们已无法考证“神圣”究竟体现在何处,如直译,传递给现代读者的信息则为零。同样,将“白如雪”译成某些从未见过雪的地方语言时,则变成“白如霜”或“白如白鹭毛”。笔者不敢苟

同,认为此译法有悖翻译的忠实原则。

二、解构主义的双重性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产生了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德曼等,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文本一旦完成,其语言符号便开始起作用,读者通过对原文文本的解读来获得文本的意义。把上述观点引入翻译研究,解构主义者认为原文必须通过译文才能生存下去。由于原文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因此每一次翻译就改变了原文的意义。解构主义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认为“翻译不是对原文的意义进行传递、复制、再现和交流的过程,而是对原文的语言不断进行修改的过程”^[6]^[63]。德里达认为:即使是“正确”的翻译也与原文的意义不符,因为翻译是原文语言生命的延续,使原文语言意义得到升华^[6]^[66]。由此可见,在解构主义看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不再是传统翻译理论主张的‘模式——复制’关系,而是平等互补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7]

解构主义对于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对译文与原文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译文是不同于原文的一个新文本,文本的意义来源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原文文本中心论”,与奈达的“等效论”相比,更客观地体现了翻译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强调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差异性,使翻译理论逐步从规定性走向描述性。

但解构主义关于意义的不定性及译文和原文无相似性的观点,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解构主义看来,原文就像一个被打碎的花瓶,无论怎么拼接都不能还原。正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译者可以随意拼接原文的碎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虽然原文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译本,但这些译本都是在原文所提供的框架之中。译者和译文读者对于原文和译文的理解确实存在差异性,但文学文本意义的开放性或无限可解释性决不意味着意义的消解,而是对绝对客观的、专断的意义的否定。对意义的理解不仅有个体差异性,更有共同普遍性,否则巴贝塔早已塌陷,不同民族的人们无法交流,阅读和翻译也就无从谈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对意义解读的

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呢?美国文艺理论批评家霍兰认为文本的解读是由不同层次的反馈回路构成的过程,具有双重特性。“既是独特个性的又是共同的和在文化上被决定的。”根据霍兰的读者反应学说,阅读的反应分为3个层次:①阅读的生物物理动作;②阅读的文化部分;③个人因素。其中生物物理层次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层次受到特定文化(尤其是民族)的影响,只有第三层次是完全体现个体差异^[8]。由于阅读过程中这3种回路同时发生,必然造成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存。即使按照解构主义的说法,译者拼接的仍然是原文的碎片,虽不能将原文完整复原,却都来源于原文,无论拼成什么图案,都深深地烙上原文的印记。

由此可见,在读者与文本的关系中(包括译者与原文,译文读者和译文的关系),既不能片面追求读者间反应的一致性,也不能因为理解的个体差异而抹杀原文文本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创新期待不容忽视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译文?应该怎样看待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像奈达那样为照顾译入语读者的习惯而修改原文内容,还是尽量保持原文的风姿,则是以读者为出发点的翻译理论给我们留下的又一个课题。笔者认为,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翻译理论应该包含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成果。西方接受美学中的阅读理论可以对翻译理论中的读者研究有所启迪。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认为,读者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是文学阅读理解得以可能的基础。所谓期待视界,是指“读者积累起来的,作为文学阅读的前理解和前结构而存在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的总和”。期待视界的作用有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定向期待指“文学作品提供的具体意象、意义的潜在可能性与读者视界中先在的心理结构的潜在可能有相通之处^[9]”。其中创新期待是读者更内在,更深层的自然倾向。他们渴望打破习惯方式,调整自身的视界结构,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作品中与原有视界不一样的甚至相反的东西。这种创新期待作为一种内在欲求有助于缩短与克服和作品的审美距离,开拓和扩大原有的期待视界,对于读者阅读视界的建立,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内在动力。创新期待来源于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意义的空白以及各语义单位存在着连接的“空缺”。这些都成为激发和诱导读者进行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基本驱动力,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召唤性含义。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必须充分考虑读者的创新期待。读者的定向期待似乎受到了过分重视,一味强调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会

使读者对异域文学作品的新奇感和兴趣大大降低,妨碍译文的阅读效果。诚然,有些地方从不下雪,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见过雪,但并不表明他们没听说过雪,也不妨碍他们对雪进行想象和憧憬。如果在翻译中将原文中的“白如雪”直译过来,则有助于加深这些读者对雪的印象,有利于刺激他们的阅读兴趣,扩建他们的审美观结构和期待视界。从这一点来说,译成“白如霜”或“白如白鹭毛”效果都不如直译来得好。当然,强调迎合读者的创新期待,并不是不顾广大普通读者现有的接受能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译文读者确实难以理解或者根本不懂的东西,可以适当地归化,也可做一些注释,但总之洋味是要保留一些的,这也是大部分译文读者的要求。曾经有学者对译文读者的阅读倾向做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大部分被调查者都希望译文能保持原作的语言和风格特点,即使不大符合中文的习惯用法,只要能看懂就行^[10]。可见,尊重原著,保留原著的风姿也是尊重读者的利益,顺应读者的要求。

四、结 语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文本、译文、译者和译文读者4个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者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应该指出的是,在翻译的4个互动因素当中,原文文本是核心,是翻译的根据和出发点,译者首先应全面地把握原文内容及风格,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或要求,将源语翻译成目的语。

参考文献:

- [1] SAVORY T. The art of translation[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7: 57-58.
- [2] 谭再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80.
- [3] NIDA E A,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Brill, 1969: 24.
- [4] 吕俊.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 外国语, 1997(2): 39-44.
- [5]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1992: 93.
- [6]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7]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86.
- [8] 周宪. 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134-135.
- [9] 朱立元. 接受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34.
- [10] 姜秋霞, 张柏然. 是等值还是再创造——对文学翻译的一项调查[C]//张柏然, 许钧. 译学论集.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7: 155-162.